

外商直接投资激励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分析

顾永红 胡汉辉

内容提要 FDI如何影响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有关产业结构与FDI之间关系的理解不仅不充分,而且还存在许多争论,比如“促进论”和“抑制论”,等等。本文试图研究FDI激励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影响机制。本文的模型表明,FDI激励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东道国与投资母国之间产业技术差距,二是东道国产业的市场结构。此外,本文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外资企业的中间产品需求及导致的中间产品本地化生产,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新型工业化 FDI激励 中间产品 产业升级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 F8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964[2007]10-070522-0377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随着加入WTO,中国已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国家之一,2002年甚至一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流入国。外资流入量的急剧放大,使得外资能否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土中间产品购买是否增长等问题,成为目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如何采取更为有效的FDI激励政策,扩大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是中国利用外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在制定FDI政策过程中需要正视和亟待加以解决的难题之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西方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大量理论抽象和实证分析,阐述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和行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Dunning的OLI理论,认为企业采取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企业专属利益(Ownership advantage)、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和企业的内部化利益(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等三方面因素^[1]。部分学者对FDI激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节约成本和市场开拓的角度分析,将FDI归结为一种套利行为,其主要形式是建立“开发区”、“进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等,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土地和融资上的优惠。

Brander和Spencer认为,政府提供这类出口补贴,主要是为了在寡占市场上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转移他国企业的利润^[2]。Hwang和Mai等综合现代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于区位诱致效应(location-induced effect)^[3]。青木昌彦等认为,模块化生产技术的革新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即由于产业链的每个工序分别按一定的“块”进行调整和分割,每个环节和工序都有不同的价值。模块化反映在国际分工上就是:企业生产某一产品时,不再需要把所有的工序集中在一个地方,国际分工的边界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一国的竞争优势也随之不再仅仅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者某一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为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控制着附加价值较高的产品设计开发及关键零部件生产和售后服务环节,而将产品组装等利润空间小的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或者转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保持自己在整个产业的领先地位^[4]。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江小涓在大量数据分析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出口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贡献^[5]。沈坤荣和耿强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显著因素。但这些理论都局限于实证分析层

面^[6]。王红领、李稻葵等学者归纳了FDI对中国自主研发的三种观点,即抑制论、促进论和“双刃剑论”,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观察FDI对中国民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 响,他们的研究结论支持了“促进论”的观点^[7]。理论层面的最近研究是由于津平完成,他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无论是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过多的优惠政策,均不能使短期利益达到最大;但从动态考虑,外资优惠政策能否提高国内居民的福利水平,这取决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8]。于津平的研究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理解FDI及其激励政策的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其研究在于宏观层面,特别是限于东道国国民福利层面,并没有深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

在全球分工的前提下,外国投资者将生产的某个环节转移到东道国,该生产环节所处价值链的位置直接影响东道国的利润分享。从国际产业分工和竞争来看,中国的外资主要集中在中低档产品和加工制造业的中低价值环节。基于这一客观现实,国内学术界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一部分学者持“技术借用论”的观点,认为FDI流入中国后就会带来技术,这是没有前提的。跨国公司要占领中国市场,自然就会带来先进技术。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于东道国的首要目的是获利,保持其先进技术的垄断优势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尤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通过FDI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几率非常有限。因此,在肯定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正效应的前提下,从FDI激励和产业升级的互动关系出发,探讨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采取更为合理的FDI激励政策,能够对上述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作一个初步的解答。

二、模型及引出的推论

我们假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东道国产业结构水平低于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将产品生产的某个环节转移到东道国生产,分别建立纵向一体化的子公司,由于要获取东道国的比较优势资源和优惠,他们之间存在竞争。在这一前提下,本文建立一个两国企业同时在东道国市场参与FDI竞争的双头垄断模型,讨论在东道国市场存在投资选择或FDI竞争激励(主要是税收、土

地、融资等优惠政策)的情况下,这种激励对企业的投资决策的可能作用,由此分析FDI激励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 基本假设

假设国家A和国家B各有一个企业1和2,同时将产品生产的某一环节*i*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到东道国C的市场,即企业1和企业2在C国的*i*产品生产上形成双头垄断。当企业确定自己的投资区位时,东道国政府将对企业给予税收、土地和融资等优惠,这将降低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当优惠远远高于企业的运输成本等交易费用时,企业将会扩大直接投资;当优惠降低至不能弥补企业的运输成本等交易费用时,企业将会放弃对东道国C的直接投资,而可能将生产转移到别的国家和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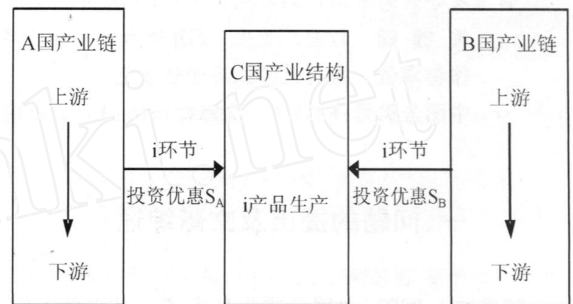


图1 两国FDI竞争与东道国产业结构

本模型的博弈过程可以描述如下:在第一阶段,国家A和国家B的企业在面对东道国政府所采取的投资优惠*S*条件下,比较其预期收益,两国企业同时决定采取在某一产品*G*的*i*生产环节进行直接投资的决策。第二阶段是两国企业在决定生产区位后,在东道国市场开展Cournot产量竞争。第三阶段,假定*j*产品是比*i*产品在产业结构上更高的环节,东道国对*j*环节实施更高的优惠政策, A国和B国的两企业在上述产品*G*的*j*生产环节进行直接投资的决策。

本文的设定是基于Brander和Spencer(1985)文章的模型,但本文的设定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将两国企业投资东道国C的行为一般化,即仅根据优惠的或者补贴的多少决定投资决策;二是假设A国的*M*家企业

江小涓就持此种观点,她考察得出了技术先进与否的标准是生产产品及机器设备的先进性。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法等学者持此种观点。王春法对江小涓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机器设备和技术能力是不一样的。FDI对本地企业的研发活动是挤出的和替代的。路风在其《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汽车工业已掉进了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循环之中。

有能力生产产品 G 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B 国的 N 家企业只能生产产品 G 的最终产品, 且必须向 A 国企业进口中间产品; 三是 A 国和 B 国企业生产最终产品都必须就近取得中间产品。由于要建立的是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 为简化分析, 假设 C 国市场的反需求函数为线性, 表示为 $P = a - bY$, 其中 P 为产品 G 的价格, Y 为其总产量。为反映 A 相对于 B 国是技术领先国家, 在投资东道国后, 虽面临相同的劳动力市场, 但为保持自己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 倾向于雇佣生产能力较高的劳动力, 假设 $W_A > W_B + t$, 其中 W_A 、 W_B 分别为两国在东道国的劳动成本, t 为企业东道国的运输一单位产品 G 的成本。

2 FD 激励对最终产品市场的影响

东道国 C 在对从事 j 生产环节和从事 i 生产环节的企业分别给予不同的补贴优惠, 在既定的补贴水平下, 我们用倒推的解法, 来推导不同生产环节产品的市场均衡。在第三阶段中, A 国 M 家企业和 B 国的 N 家企业在 j 产品市场进行 Cournot 产量竞争, C 国对能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 A 国给予 S_A 的优惠补贴, 而对只能生产中间产品的 B 国企业给予 S_B 的优惠补贴, 其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A_e^A = [P - (W_A + C_A) + S_A] Y_e^A \quad e = 1, \dots, M, \quad (1)$$

$$B_f^B = [P - (W_B + C_B) + S_B] Y_f^B \quad f = 1, \dots, N. \quad (2)$$

A_e^A 为 A 国第 e 家企业在 C 国市场生产 j 产品所获得的利润, C_B 为 B 国企业购买 A 国 i 生产环节产品所支付的单位购买价格。

A 国和 B 国两国的企业分别选择最适当的 j 生产环节产品产量 y_e^A 和 y_f^B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由 (1)、(2) 两式的一阶条件联立求解, 可求得两国各企业的最适当产量分别为:

$$y_e^A = y^A = \frac{a + N(W_B + C_B - S_B) - (M + 1)(W_A + C_A - S_A)}{b(M + N + 1)}, \quad (3)$$

$$y_f^B = y^B = \frac{a + M(W_A + C_A - S_A) - (N + 1)(W_B + C_B - S_B)}{b(M + N + 1)}, \quad (4)$$

因此, j 生产环节产品的总产量和价格分别为:

$$Y = \frac{a(M + N) - M(W_A + C_A - S_A) - N(W_B + C_B - S_B)}{b(M + N + 1)}, \quad (5)$$

$$P = \frac{a + M(W_A + C_A - S_A) + N(W_B + C_B - S_B)}{(M + N + 1)}, \quad (6)$$

将计算结果代入 (1)、(2) 两式后, 两国企业的利润可写为:

$$A_e^A = A_e^A = \frac{a + N(W_B + C_B - S_B) - (N + 1)(W_A + C_A - S_A)}{b(M + N + 1)^2}, \quad (7)$$

$$B_f^B = B_f^B = \frac{a + M(W_A + C_A - S_A) - (M + 1)(W_B + C_B - S_B)}{b(M + N + 1)^2}. \quad (8)$$

3 FD 激励对中间产品市场的影响

由于东道国的产品 G 市场为 A 国和 B 国企业之间的 Cournot 产量竞争, 前文已假定 A 国能生产中间环节产品和最终环节产品, B 国只能生产最终环节产品。在上述前提下, 生产每一单位的最终环节产品就需要一单位的中间环节产品, (4) 式恰好反映出 B 国投资于 C 国的一单独企业对 A 国投资于 C 国的企业所生产的中间环节产品的需求。因此, N 家 B 国最终环节产品生产企业对 A 国企业在 C 国生产的中间环节产品的需求加总, 并可用反需求函数表示为:

$$C_B = \frac{a + M(W_A + C_A - S_A)}{M + 1} - (W_B - S_B) - \frac{b(M + N + 1)}{(M + 1)N} P^m, \quad (9)$$

上式中, P^m 为东道国市场 G 产品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的需求量。分析 (9) 式可知, 当东道国 C 提高对最终产品生产环节 j 的补贴时, 即 $S_B > S_A$ 时, 会使 B 国企业在东道国 C 的产量增加, 从而造成对 i 中间生产环节产品的需求增加; 当东道国 C 提高对 i 中间生产环节的补贴时, 即 $S_A > S_B$ 时, 在 Cournot 竞争条件下, 会造成 B 国企业的产量下降, 从而导致 i 中间生产环节产品需求的减少。即:

命题 1 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及产业链环节与投资母国的产业结构和东道国政府对外资的优惠补贴政策的差异性因素有关。在资本禀赋少、劳动禀赋多的前提下, 发展中国家如果主要是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在最终产品的加工环节给予更大的优惠补贴, 就能够在该环节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当东道国 C 提高对最终产品生产环节 j 的补贴时, 如果 A 国企业无法扩大中间生产环节产品的需求, B 国企业也就无法扩大最终生产环节产品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 会出现以下两种主要情形: 一是 A 国企业必须减少自身对中间产品的需求, 但这会减少其最终产品产量, 对自身利润产生影响; 二是提高中间产品的价格, 足以弥补 A 国企业为让渡中间产品需求而减少最终产品生产所导致的损失, 但这会提高 B 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当东道国 C 提高对 i 中间生产环节的补贴时, 由于 B 国现有企业产量下降, 如果 A 国企业不扩大最终生产环节产品的产量, 为消化 i 生产环节的产能, A 国必须降低 i 生产环节产品的价格, 分摊部分补贴给 B 国企业, 为获取分摊利润, B 国的企业数 N 将增加。

令 A_{U_e} 为 A 国纵向一体化企业上游企业销售中间产品所得利润, A_{D_f} 为其下游企业生产最终产品所得利

润,那么,单个 A 国纵向一体化企业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frac{A}{e} = \frac{A}{U_c} + \frac{A}{D_c} = (C_B - C_A - t) P^m + \frac{A}{D} (C_B) \quad (10)$$

由此,可得到 (10) 式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frac{\partial \frac{A}{e}}{\partial P^m} = [(C_B - C_A - t) + \frac{\partial C_B}{\partial P^m} P^m] + \frac{\partial \frac{A}{D}}{\partial C_B} \frac{\partial C_B}{\partial P^m} = 0 \quad (11)$$

上式中, $[(C_B - C_A - t) + \frac{\partial C_B}{\partial P^m} P^m]$ 为 A 国纵向一体化企业生产 G 产品上游产品所获得的边际利润; $\frac{\partial \frac{A}{D}}{\partial C_B}$ 为 A 国纵向一体化企业生产销售 G 产品上游产品对下游产品利润产生的影响。

因此,从 (9) 式和上述的分析可知,本模型中的第二个阶段, A 国 M 家企业面对 B 国 N 家企业对中间产品的需求,根据中间产品的 Cournot 竞争情况决定中间产品的产量。在这一阶段中, A 国的 M 家企业除了考虑向 B 国企业销售中间产品可获得的利润外,还要考虑东道国 C 在对不同的生产环节给予不同的优惠补贴时,销售中间产品给 B 国企业所导致的在最终产品市场和中间产品市场上的最终利润总和。也就是说, A 国企业必须从上、下游产品生产总体利润的最大化的角度来进行中间产品的生产决策。

由 (9)、(11) 式联立求解,可求得 A 国每个纵向一体化企业的最合理上游生产环节产品产量:

$$P^m = \frac{N(M-1)(a-C_c) - (M+1)^2(W_B+t-S_B) + (M^2+M+2)(W_A-S_A)}{b[(M+1)^3+N(M^2+1)]} \quad (12)$$

将 (12) 式代入 (9) 式可得:

$$C_B = \frac{1}{(M+1)^3 + N(M^2+1)} \{ (3M+N+1)a + M(M+1)(M+N+1)t + M(M-N-1)(W_A-S_A) + M^2(M+N+3)C_A - [(M+1)^2 - N(M-1)](W_B-S_B) \} \quad (13)$$

观察上式可得出:运输成本对中间生产环节产品价格具有重要影响,当运输成本因素越高时, C_B 即上游生产环节产品的价格就越高。如果我们把这一结论与命题 1 联系起来分析, C_B 的提高会导致上游生产环节产品需求的提高,这有可能激励 A 国纵向一体化企业扩大中间生产环节产能。

命题 2 技术先进国家在投资发展中国家时,初始阶段以利用东道国的廉价劳动为基础,往往以下游的加工贸易为开端,即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加工基地,输出组装技术和中间产品,再把最终产品销往世界市场。随着最终产品产能的扩大,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随之上升,加之东道国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为满足下游生产对上

游中间产品的需求增长,技术先进国就会考虑就近生产更多的中间产品,由此,会有更多的中间生产环节和最终生产环节都落户东道国。

同时,技术先进国投资发展中国家中间产品需求也可能产生就近需求,引发东道国中间产品产能需求扩大,从而促进东道国从初级产品加工向中间产品加工供给转变,由此形成一系列的产业配套。产业配套在相关区域的集中,往往会形成某一产业的集群。这种高于东道国原有技术水平的产业集群,会在区域内外形成扩散效应,甚至推动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主导产业替代。苏州发展迅速的 Π 产业集群,就是这种由外资集聚而形成的地区产业升级效应。

三、FDI 激励的福利分析: 内外资企业的互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仅在于引起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对东道国国内企业产生外溢效应,我们可以把 B 国企业换成东道国 C 的国内企业,那么,东道国政府一方面要通过激励外商直接投资来推动产业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要从国民福利最大化的角度,通过给予国内企业补贴,推动本国企业自主性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

下面,我们来讨论东道国 C 在 A 国纵向一体化企业直接投资该国时的补贴政策。东道国补贴本国最终产品企业的目的是要实现福利最大化。那么,东道国 C 的福利函数可以表示为其企业利润减去其对本国企业的补贴:

$$W^C = L^C - S_c L_y^C \quad (14)$$

也就是说, C 国政府决定内资企业补贴 S_c 以实现福利最大化。由上式 W^C 对 S_c 微分可得其决定 S_c 的一阶条件,结合 (4)、(12)、(13) 式,可求得在 $S_A = 0$ 的条件下, C 国补贴本国企业的最佳标准是:

$$S_c = \frac{[(M-1)(M+1)^2 - L(M^2+1)]}{2(M+1)^2 [L + M(2+M+ML) + 1]} \{ (M-1)(a-c-w_c-t) + (M^2+M+2)(w_A-w_B-t) \}, \quad (15)$$

从 (15) 式可知: (15) 式中 $[(M-1)(a-c-w_c-t) + (M^2+M+2)(w_A-w_B-t)]$ 项必为正,因此 S_c 的符号由 $[(M-1)(M+1)^2 - L(M^2+1)]$ 的正负决定,也就是由东道国的市场结构决定。进一步观察 (15) 式可知: 当东道国的企业数量 L 相对 A 国投资该国的企业数 M 很少时,东道国政府为了促进本国企业的发展,应

该给予国内企业补贴；当外国企业 M 很小，而 L 很大时，为激励外国投资，应该减少对国内企业的补贴，增加对外资的补贴。当外国企业只有一个即 $M=1$ 时，东道国对国内企业的补贴应该为零，因为继续补贴国内企业，将强化本国企业的寡头垄断地位，增加外国企业进入的市场不确定性；当 $M=L=1$ 时，此种条件下不存在产业结构的问题，东道国对内外企业都不应该补贴，才能保持福利最大化；或对产业结构更高的外国企业进行补贴，引入新的外商企业，改变竞争结构，从而促使原有的外商提高其投资的技术水平。因此，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 3 东道国对国内企业的补贴政策主要取决于本国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对的市场结构关系。内外企业的数量越多，东道国吸引外资的产业结构层次就可能更高。因此，东道国的产业补贴政策能够实现内外企业数量的均衡。

在假设 A 国 M 家企业是纵向一体化企业的条件下，综合分析命题 1、命题 2、命题 3 可以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 1: M 数量越多，表示 A 国投资东道国的产业链越长越复杂，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的控制程度更高，东道国对 A 国资本的依存度更高，考虑国家产业安全应该成为东道国政府的重要议题。这一推论间接证明了 FDI 可能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

推论 2: 当 N 数量很大时，表示东道国的外资结构处于技术相对较低的层次，提高 A 国企业的投资规模是其外资政策的着力点；

推论 3: 当 L 数量很大时，表示东道国产业的封闭性较高，国内企业可能处于过度竞争状态，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该产业的开放度，由此需要减少对国内企业的补贴，而将政策激励的重点转向外资企业。这一推论与推论 2 一起共同证明了有关 FDI “促进论”的合理性。

推论 4: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层次与东道国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相对产业结构差异有关。东道国国内企业的产业结构层次越接近外商直接投资的母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水平就越高，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就越快。因此，提高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学习模仿和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外资对本国产业结构升级效率的关键。这一推论为证明有关 FDI 的“抑制论”和“促进论”提供了约束条件。为此，本文的推论也印证了有关 FDI 的“双刃剑论”^[9,10]。

四、结论

本文从理论模型的角度分析了 FDI 激励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最重要的发现就是 FDI

激励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必须基于一定的约束条件，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一般经验论证的非充分性。根据模型的分析，本文有如下发现：(1)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的初始阶段，往往是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采取内外不同的优惠政策，能够吸引技术水平和资本密度高于内资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本国，从而达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2)随着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减弱甚至消失，仍然实行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 FDI 政策将会失效，产业结构可能会陷入产业链的末端。此时应该根据产业结构的差异实行更为细致而灵活的 FDI 激励政策，政府的 FDI 激励政策应该围绕产业结构升级而展开。

(3)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采取的 FDI 激励政策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本国产业与外商投资母国相应产业在技术水平方面的差异，差异越大，就越要采取较强的 FDI 激励政策，反之则采取较弱的 FDI 激励政策；二是考虑本国产业的市场结构，本国市场竞争性越强，采取的 FDI 激励政策就应相对弱一些，如果本国产业的垄断性越强，采取的 FDI 激励政策就应强一些。(4)从最终产品生产向中间产品生产的扩张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根据产业的不同技术差异和市场结构，促进中间产品需求增长及本地化生产，是 FDI 激励政策的重要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 [1] Dunning, J. H.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1.
- [2] Brander, J. A. and B. J. Spencer. 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 18: 83-100.
- [3] Hwang, H. and C-C. Mai. The Tariff-jumping Argument and Location Theory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 32: 109-129.
- [4] 青木昌彦, 安藤晴彦. 模块时代: 新产业结构的本质 [M].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 [5] 江小涓. 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 [J]. 经济研究, 2002 (9).
- [6] 沈坤荣, 耿强.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5).
- [7] 王红领, 李稻葵, 冯俊新. FDI 与自主研发: 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6 (2).
- [8] 于津平. 外资政策、国民利益与经济发展 [J]. 经济研究, 2004 (5).
- [9] 郭克莎. 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选择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1).
- [10] 董书礼.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与我国产业技术进步 [J]. 中国科技论坛, 2004 (2).

(责任编辑: 段锡平)

ports from the "non-market economy countries" due to that the policy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s getting stronger. The pressure coming from the U. S. Congress becomes greater and tha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 S. products is getting weaker. The act of applying Anti-subsidy and Countervailing Law to China will lead to the dispute on anti-subsidy between Sino-U. S. becomes more acu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must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and deal with it seriously.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entive Policy on Industry Upgrading

GU Yonghong Hu Hanhui(59)

How does FDI effec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host countr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inkage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DI is incomplete, and there are many arguments, such as "the theory of promoting" and "the theory of repressing", etc. The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effect mechanism about FDI incentive policy in industry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model shows that in FDI policy, there are two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ne is the techniqu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reign investment country and the host country, another is the market structure of host country. In addition, the study gets an important detection that the increasing needs for intermediate products and the local production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are the key factor that promot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Strategic Choice and Performance of Korean Subsidiaries in China: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Jing Zhiheng(64)

According to the Subsidiary theory of MN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Korean subsidiaries that are located in China. Korean subsidiaries' strategy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in China are taken as study object. This research, based on integration-responsiveness model of Prahalad & Doz, finds out four kinds of strategic types, and studies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strategy and the effect on the choice of both head office and subsidiary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New Trend of Japanese FTA/EPA and the Countermeasure for the Difficulty Starting Sino-Japan FTA

Liu Changli(70)

Facing the new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that the bilateral FTA and multi-pattern FTA are developing simultaneously, Japan has changed its trade policy that only focused on WTO, to be positive for bilateral FTA. The process of the signing-up of FTA by Japan with other nations has speeded up, even it began to discuss the bilateral FTA with U. S. and EU. On the contrary, Sino-Japan FTA is not only put in the inferior position, but also doesn't get positive response after China government made active declaration. This negative attitude of Japan to Sino-Japan FTA doesn't fit its trade policy and bilateral interests, and it also brings some bad influences to East-Asia free trade Are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st-Asia community.

China's Aid to Africa: Oil Oriented or Not

Zhang Haibing(76)

China's aid to Africa is generally defined by western voices as oil-oriented, which is largely beca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oil competition in Africa Continent. If it takes account of the 50 years history of China's aid to Africa, we can find the definition is not true. Furthermore, when check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aid and compare the advantages of China-Africa's trade, we also find that is not true. The nature of China's aid is to help Africa to achiev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consequently realized the aim of prosperity side by side.